

虎簋断代与浙川楚墓中的复古现象

上海博物馆 周亚

提要：河南浙川徐家岭10号墓出土四件方座簋后，传世的虎簋断代问题被重新提出，本文通过对西周中晚期的考古资料及相关传世青铜器的分析后认为，虎簋在器形、纹饰、铭文及铸造工艺等方面与西周晚期的青铜器有着比较密切的关联，所以虎簋仍然应该是西周晚期的青铜器。河南浙川徐家岭10号墓出土的方座簋，同墓出土的青铜龙纹鬲及浙川征集的方座簋，表明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在浙川楚墓中存在着一些以西周中晚期青铜器为样本的“复古”作品。

关键词：虎簋、断代、复古

虎簋最早著录于吴大澂的《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以后《窳斋集古录》著录了三件虎簋铭文拓片，其中一件器盖齐全，另两件仅存簋盖。现知存世虎簋共有三件，均器盖齐全，一件现藏上海博物馆，一件藏日本MOA博物馆，一件藏日本箱根美术馆。将这三件虎簋拓片与著录比对，可知日本MOA收藏的即原为蒲城杨氏所藏；上海博物馆的虎簋之盖原为窳斋所藏，器铭未见窳斋著录；日本箱根美术馆的虎簋铭文也未见窳斋著录。据沈之瑜介绍 1959 年苏州文物保管委员会购得两件虎簋盖，其中一件后赠予上海博物馆¹，然向苏州博物馆了解，该馆并未收藏有虎簋盖，故窳斋著录其自藏的一件虎簋盖现已不知下落。

除吴大澂以当时认识水平，认为虎簋是商器外，其余著录多以为是西周中晚期之器。随着西周考古资料的日益丰富，虎簋为西周晚期之器已成为大家的共识。直至 1991 年发掘的河南浙川徐家岭十号墓中出土了四件除双耳外，器形、纹饰与虎簋几乎完全相同的青铜簋²。

¹ 沈之瑜《环带纹方座簋》，《文物》1960年第2期68页。

²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浙川县博物馆《浙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257页，彩版六八.2，大象出版社，2004，郑州。

河南的考古人员根据徐家岭十号墓出土器物的风格特点将该墓的时代定为战国早期，并认为：“铜簋（M10:81）与战国早期曾侯乙墓铜簋（C.109）形制大体相似，仅耳不同，圈足也有差别”。³另外，浙川县博物馆的展厅中陈列了一件在浙川仓房乡东沟村征集的青铜簋，这件簋的器形（包括器耳）、纹饰均与虎簋完全相同⁴。由此，虎簋的断代又作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而被提出。

2009 年上海博物馆在英国不列颠博物馆举办“上海博物馆珍品展”，牛津大学罗森教授作为展览的策展人，她在展览图录的虎簋说明中就认为：“在河南省浙川徐家岭M10 中的 4 件器物，提供了和这件簋比较精确的相似之处”⁵，虽然如此，她却仍然将虎簋定为公元前 7—6 世纪之物。按照中国传统的时代划分，这段时间应该属于春秋中期。然而，从春秋中期到战国早期，之间有 200 年左右的时间，虎簋与徐家岭十号墓出土簋，它们的形制、纹饰如此接近，两者却要相距 200 年左右的时间，这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现象，我认为至少在引用徐家岭墓出土簋给虎簋重新断代这一点上是不合适的。当然罗森教授并未完全按照徐家岭十号墓出土簋的时代给虎簋断代，但她也没有指出将其定为公元前 7—6 世纪的充分理由。在图录的虎簋说明中她注意到罗泰教授在《*Antiquarianism in Eastern Zhou Bronzes and its Significance*》一文中提出“在一些前 7、6 世纪墓葬中出土有两套不同的器物。其中一套代表了当时最新颖的款式，而另一套则是以往传

³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浙川县博物馆《浙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330 页，大象出版社，2004，郑州。

⁴ 云南大学丁尧同学提供照片及相关说明

⁵ Jessica Rawson 《TREASURES FROM SHANGHAI ANCIENT CHINESE BRONZES AND JADES》108, THE BRITISH MUSEUM AND SHANGHAI MUSEUM PRESS, 2009

统的样式了”意见。也许这就是罗森教授将虎簋断代为公元前 7—6 世纪的依据所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前提就必须认定虎簋属于春秋时期那种“复古主义作品”。对此，我觉得有必要作些探讨。

首先要讨论的是出土地点问题，《殷周金文集成》02974虎簋的注释中出土一栏中称：虎簋“傳陝西扶風縣法門寺出土（據吳大澂題跋）”。查有关虎簋的著录书目，其中《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与《窻斋集古录》为吴大澂所著，然《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二三未注出土地，而《窻斋集古录》第七册一三虎簋拓片下吴大澂题：“是商敦有方座，蒲城杨氏藏有一器一盖，余借拓焉。余又得其二盖。作虎形者，即古之虎彝也。凤翔出土时原有二器四盖。”由此可知《集成》关于虎簋出土地点的记载是搞错了。《窻斋集古录》吴大澂在其收藏的两件虎簋盖拓片后自题：“此皆窻斋按试西安时所得”，又“蒲城杨氏藏有一器一盖”，两地都在今陕西境内，为此我们认为吴大澂关于虎簋出土于凤翔的记载，是基本可信的。

凤翔毗邻周原，在商周时期是周人生活的主要区域之一，春秋以后，随着周王室东迁，此地遂为秦人所有，《史记·秦本纪》：“德公元年，初居雍城”⁶，德公元年为公元前677年，此后直到献公二年（公元前383年）的二百九十余年间，雍城一直是秦国的都城，成为秦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雍城就位于凤翔县城南部，考古发掘资料也证实了相关的历史记载。我们检索了凤翔县先秦时期的考古

⁶ 《史记》卷五，中华书局 1982 年点校本 184 页

资料，可以发现凤翔地区商周时期的考古资料基本上是以周人的遗址或墓葬为主，出土器物也是属于典型的周文化。但东周时期的考古发现则是以秦文化为主，很少有秦文化之外的考古资料。⁷

但是，我们在春秋战国时期秦国青铜器中，找不到任何与虎簋的器形、纹饰或铭文有关联的器物。同样，我们也看不出虎簋有任何秦文化的因素存在。为此我们认为虎簋应该不会出土于凤翔地区春秋战国时期的遗址或墓葬中，它们很可能还是出土于凤翔地区的西周遗址或墓葬中。

其次，我们要讨论虎簋器形、纹饰及铭文与西周时期考古资料、和传世西周时期青铜器之间的关联。虎簋的器形、纹饰和铭文在西周考古资料中的确比较少见，但与之相关的考古资料还是存在的。如1984年扶风齐家村八号窖藏出土有四件方座簋，器形、纹饰与虎簋非常相似，仅两兽耳做得较为简单，盖面没有设置扉棱，盖的捉手作圈形，没有莲瓣装饰。与虎簋相比，显得比较简朴。陕西的考古工作者认为它们是西周中期的器物。⁸

在传世青铜器中，我们还可以找到几件与虎簋器形、纹饰关系密切的西周青铜簋。如宋代《考古图》等著录，传出扶风的西周中期牧簋，器形、纹饰都与虎簋几乎完全相同，只是缺盖，无法得知其盖之形式与纹饰。牧簋铭文中有关内史吴，此人或称作册吴，多见于西周恭、

⁷ 虽然1979年在凤翔高庄战国秦墓中出土有一件战国中山国的铜鼎，1977年在凤翔高王寺战国铜器窖藏中出土有吴王孙无土鼎，但是我们无法因此得出虎簋是出土于凤翔春秋战国时期墓葬中的外来器物的结论。

⁸ 周原扶风文管所《扶风齐家村七、八号西周铜器窖藏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1期。

懿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中，如恭王时期的师寘簋、懿王时期的师虎簋、吴方彝盖等。故牧簋一般被认为是西周懿王时期的器物。

林巳奈夫先生的《殷周青铜器综览》一书中簋形器第 330 号簋，除了缺盖外，器形、纹饰也与虎簋几乎完全相同，林巳奈夫将其定为西周 IIIA，即西周晚期早段。

由于牧簋和林巳奈夫书中 330 号簋均缺盖，无法和虎簋做盖的形制、纹饰比对。但是虎簋和浙川徐家岭 10 号墓出土簋的盖上捉手的形制非常具有特色，作实心平顶微凸的莲瓣形，与簋盖捉手一般做圈形的形式有所区别。这种簋盖捉手的形式，在以往的考古资料中从未见过，所以很有必要对这种捉手形式的渊源及出现时间做些探讨。

铜器盖上捉手做实心平顶的式样，从目前我们知道的考古资料来看，约出现在西周早中期之际的青铜器上，如 1976 年 4 月陕西岐山县贺家村西周墓出土一件龙纹簋，盖上捉手就是作实心平顶的式样。发掘报告将出土这件簋的 112 号墓定为西周穆王时期⁹，但从其所饰龙纹与 1955 年 5 月辽宁喀左县马厂沟铜器窖藏坑出土匜侯孟所饰龙纹几乎相同的特点看，这件簋有可能是西周早期的铸品¹⁰。

又如 1991 年陕西扶风县法门镇齐家村村东西周墓出土的鬲卣，盖上捉手也作实心平顶的式样¹¹。鬲卣的形制与西周昭王时期的召卣相同，装饰也很接近，其时代应该也是属于西周早期后段。

此外，西周中期的追簋、番生簋盖的盖上捉手都是作实心平顶的

⁹ 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贺家庄西周墓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8）77 页，文物出版社 1983 年，北京

¹⁰ 热河省博物馆筹备组《热河凌源县海营子村发现的古代青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5 年第 8 期 16 页、图版 7

¹¹ 曹玮主编《周原出土青铜器》第九册 1893 页，巴蜀书社，2005 年版

式样。

虎簋盖上捉手的样式应该是沿用了这种实心平顶捉手并加饰莲瓣形后形成的一种新式样。在青铜器的盖上用莲瓣形作装饰，是西周晚期青铜器上开始出现的一种装饰形式，如扶风出土西周晚期的梁其壶、山西晋侯墓地八号墓出土的晋侯斲壶，盖的捉手处都做莲瓣形装饰。

与虎簋盖形式最为相同的一例考古资料是湖北枣阳茶菴公社出土的两件波曲纹壶，其盖上捉手的形式与虎簋几乎一模一样。发掘报告认为：“枣阳茶菴曾国墓葬，所出的铜器花纹、器形都具有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特征，与湖北京山、随县，河南新野出土的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曾国铜器相比，风格基本一致，所铸铭文字体、内容亦很接近，此墓出土的铜戈、铜矛也像春秋早期的，所以此墓的时代应为春秋早期。”¹²但发掘者在报告中没有对该墓出土的每件青铜器做出具体的断代分析。2007年出版的《曾国青铜器》一书作者对此墓出土的青铜器，分别做了比较仔细的分析、研究后认为该墓出土的铜器应该是临时拼凑的，墓中出土的曾子仲諲鼎的器主未必是该墓的墓主。他们认为与这两件壶“类似造型、纹饰风格的壶在周原多见，与此壶最接近者为1960年扶风齐家村窖藏出土的几父壶”。此外他们特别指出该壶“耳部卯式铸接的方式值得注意。耳根部两侧可见铸接的焊料凹孔，但此壶之耳并非如曾仲旂父方壶那样，铸接器壁外的榫头，而是在与耳对应的器壁留孔，由器壁内铸接包夹双耳，因此在双耳与

¹² 湖北省博物馆《湖北枣阳县发现曾国墓葬》，《考古》1975年第4期，222页，图版壹·4

器壁结合处可见凸箍，器壁内可见补铸留下的铸痕。西周晚期壶耳常常都是卯式铸接的，如三年癸壶，曾国略晚的壶如曾仲旂父方壶、郭家庙M17 壶等均采用后铸焊接之法联接双耳。”作者还提出：“在年代上，本组青铜器的簋、壶的器形、纹饰均为西周晚期周原所常见”。¹³由此可见《曾国青铜器》一书的作者是倾向于认为枣阳茶菴出土的这对有莲瓣钮盖的波曲纹壶，应该是西周晚期之器。

旅顺博物馆藏有一件卓林父簋盖，器形、纹饰与虎簋盖几乎完全相同，仅扉棱的样式稍有区别。¹⁴《旅顺博物馆馆藏文物选粹——青铜器卷》一书和《殷周金文集成》4018 认为该簋盖是春秋早期之器，但从铭文中最后一个“鼎”字的写法来看，似乎不致如此之晚。吴式芬旧藏有一件改盨，器形未见，铭末也有一相似的鼎字，《殷周金文集成》4414 断为西周晚期器。卓林父簋盖的器主与改盨的器主当同属“鼎”族。比较而言卓林父簋盖铭文中的鼎字更多保留了商晚期“鼎”字的象形写法，而改盨的“鼎”字则有所变形。因此，卓林父簋盖的很有可能是一件并不晚于西周晚期的青铜器。

这样从器形、纹饰的特点来分析，虎簋的器形、纹饰特点均存在于西周时期的考古资料或传世器物的相关器物上，

再从铭文的角度分析，几件虎簋的器盖均铸有图形化的“虎”字，一般都认为这是器主的族徽符号。这种图形化的族徽文字，多见于商代晚期的青铜器上，西周早期青铜器上也还存在，但总体数量呈明显

¹³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国青铜器》60 页，文物出版社 2007 年，北京

¹⁴ 旅顺博物馆《旅顺博物馆馆藏文物选粹——青铜器卷》21，文物出版社 2008 年，北京

的下降趋势。至西周中期以后则非常罕见。那么是否可以就此认为虎簋上这种图形化的族徽文字出现，是一种反常现象，并如同虎簋的器形纹饰一样，都是春秋时期一种复古作品呢？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讨论的。

首先在浙川徐家岭 10 号墓出土的簋上并没有铭文，而且整个浙川楚墓出土的青铜器中都未见有这种图形化的文字。除此之外，在整个楚系铭文中，除了一些所谓鸟篆体的铭文上有一些图形化的鸟形作为文字的附饰外，也几乎未见有这种图形化的铭文。这样我们应该可以排除虎簋铭文与浙川楚墓出土器物之间的关系。其次，在几乎所有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中，也没有与虎簋铭文相类似的图形铭文。虽然在战国时期巴蜀青铜兵器上有比较多的虎形图案，但它们似乎与虎簋铭文不仅在形式上存在差别，而且在性质上也可能不同。有研究认为巴蜀兵器上的虎形图案，既不是文字，也不是图腾或族徽，它们是缘于巴人对虎的崇拜而表现的虎神形象。¹⁵这样也就从铭文方面排除了虎簋与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之间的关联。

但是我们在西周中晚期的考古资料及青铜器铭文中可以发现一些与虎簋铭文相关的材料。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有一对鱼簋，是西周中晚期多见的带盖束颈鼓腹的直棱纹方座簋，内底铸有鱼形族徽。鱼簋的器形与西周中期的癸簋、宰兽簋等相同，纹饰则与癸簋、西周晚期的猷簋及晋侯墓地 M64 出土的叔氏簋（鬲休簋）等的纹饰都比较接近，所以鱼簋应该也是西周中晚期的器物。

¹⁵ 刘渝《巴蜀文化青铜兵器的虎图形初步研究》，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此外，刘体智旧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两件屯鼎，从器形看是西周中期之器，其铭文的末尾有图形族徽，作一人两手牵马，下有豕，有释作“马天豕”三字，也有释作“豕马”二字的。

又如，《殷周金文集成》06466 著录有一件西周中期的尚觶铭文，铭末有一个鸟形图案的族徽。《殷周金文集成》04399 著录一件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西周中期的仲饗盃，铭末“永宝用”的宝用两字间铸有耳形和虎形的图案，或释之为“亘虎”，此二字当是器主族徽，本该铸于铭末，却误植于宝用两字之间。

前举西周晚期的改盃和卓林父簋盖两例，铭末均铸鼎形图案，均为作器者的氏族徽号。

鱼、虎、鸟、豕马、鼎等氏族徽记均曾见于商代晚期或西周早期的青铜器铭文中，当属这些延续时间较久的氏族的族徽符号。由上述数例可证，直至西周中晚期，一些古老部族在其所铸青铜器的铭文中仍保持了标记氏族徽记的传统习俗。

由此可证，虎簋器盖铸有“虎”形氏族徽记，不可能是春秋时期的一种复古行为，它们只是西周晚期以“虎”形图案为氏族徽记的这个部族，延续了其本族的习俗，在其所作青铜器上铸上族徽而已。

此外，我们在铸造技术方面也能够找到一些虎簋与西周时期青铜簋相同的技术特点。虎簋的方座内壁有数道横直的凸线，这应该是当时的工匠为了提高方座的牢固性和承重力而特意设计的加强线。这一现象在西周中原地区的青铜方座簋上也有所发现，比如前举 1984 年

扶风齐家村八号窖藏出土有四件西周中期的方座簋，其方座内壁也有相同的横直凸线。《浙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一书，未发表浙川徐家岭 10 号墓出土的莲瓣钮波曲纹簋的方座内壁照片，器物的文字描述部分及所绘线图上均未反映出这几件方座簋的方座内壁存在有这种横直的凸线。在其余已知的春秋战国时期楚式方座簋的方座内壁也尚未知道存在有这种横直的凸线，这表明虎簋的铸造工艺更接近于西周时期的方座簋铸造技术系统，而与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式方座簋的铸造技术系统存在一定的区别。

虎簋两耳和器腹的连接方式，也表现出一些与西周中晚期青铜器两耳和器身连接方式上的相似处。虎簋两耳与器腹是采用了铸焊的工艺技术，即两耳与器身分别铸造后，在两者的连接处再做陶范，然后用铜液浇铸其中，使两者相连。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这是西周中晚期使用比较多的一种使器耳与器身相连接的工艺技术。扶风齐家村八号窖藏出土四件西周中期的方座簋，从发表的照片看，它们的两耳与器腹也是采用了铸焊的连接工艺。著名的西周厉王铜器——猷簋、西周晚期的师寰簋等也都是采用这种连接技术。除了簋形器外，当时其他一些青铜器的双耳也有不少采用了这种铸焊工艺的，比如陕西扶风庄白窖藏出土的十三年癸壶、陕西眉县杨家村窖藏出土的速盘、上海博物馆藏传宝鸡出土的西周晚期龙纹壶等。

用铸焊工艺连接青铜器的双耳与器身，虽然不是整个青铜器铸造工艺中器耳与器身连接方法的主流工艺，但这种工艺技术集中出现在西周中晚期的青铜器上，可以说表明了这是一种具有时代特征的工艺

技术。反过来，这种具有时代特征的工艺技术也可以成为虎簋断代的一个重要佐证。

经过以上从虎簋出土的考古资料、及器形、纹饰、铭文及铸造工艺等方面的分析，我们认为虎簋应该是西周晚期中原地区的制品，它们不会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制作的青铜器。我们认为，浙川徐家岭10号墓出土铜簋不能用作虎簋断代的依据，相反浙川徐家岭10号墓出土铜簋的器形、纹饰的来源，应该是以中原地区虎簋这种类型的西周青铜簋为本的，属于楚人的复古之作。

所谓春秋战国时期楚国青铜器中的“复古”问题，其实存在着两种现象，一是楚墓中出土有一些器形、纹饰带有西周中晚期青铜器上部分特点的器物，如升鼎、方壶等；另一种是完全对西周铜器的模仿和复制，比如说徐家岭10号墓出土的莲瓣钮波曲纹方座簋。我认为前者是青铜器的器形和纹饰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一种正常的延续和传承，后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复古”现象。

或以为楚式升鼎属于楚国的复古之作，是仿制西周中期以后比较流行的束颈浅腹平底鼎的样式，如克鼎、史颂鼎等，楚式升鼎上装饰比较多的垂鳞纹也是仿西周青铜器的装饰风格。我认为这个意见可以讨论，

我认为所谓的复古式青铜器应该是某种器形或纹饰在中断或停止使用一段时间以后重新出现的，才能称之为“复古”式。束颈浅腹

平底式鼎是西周中晚期比较流行的鼎的样式之一，春秋以后虽然数量有所减少，但这种样式的鼎在春秋早中期的考古资料或传世器物中还是有发现。比较典型的有春秋早期的秦公鼎，湖北随县万店周家岗出土春秋早期的廓季鼎¹⁶。春秋中期有山东沂水刘家店子1号墓出土的所谓饗鼎¹⁷；1975年和1980年湖北随县刘家崖先后发现两批青铜器，其中都有束腰浅腹平底鼎，只是两耳或作立耳式（连迂鼎），或作附耳式（盅鼎）¹⁸，《曾国青铜器》一书的作者认为刘家崖出土铜器的时代是春秋中期早段¹⁹。由此可见，束腰浅腹平底鼎在春秋早中期都曾存在，特别是湖北随县刘家崖出土的连迂鼎，器形、纹饰直接被楚人所接受，成为浙川楚墓出土升鼎的主要式样。只是这种形制和纹饰的鼎，在春秋早中期并不多见，到了春秋晚期之后的楚墓中却大量出现，并成为楚式鼎中的主体之一，这可能是被误以为浙川楚墓中的升鼎样式是“复古”现象的原因所在。

反观浙川楚墓中出土的方座簋，倒是存在着复古的现象。虽然簋形器在春秋时期依然在行用，然由于多数地区（包括楚国）青铜食器的组合开始流行鼎、簋的组合形式，簋形器使用的数量并不多，特别是方座簋几乎绝迹。只是到了春秋晚期，在一些地区又开始出现了方座簋，如安徽寿县蔡侯墓就出土有八件²⁰。方座簋的突然再现，我认为这应该是一种复古的现象。

¹⁶ 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县发现商周青铜器》，《考古》1984年第6期510页

¹⁷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沂水县文物管理站《山东沂水刘家店子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9期1页。

¹⁸ 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县刘家崖发现古代青铜器》，《考古》1982年第2期142页。

¹⁹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国青铜器》前言14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北京。

²⁰ 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安徽省博物馆《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科学出版社，1956年，北京

浙川徐家岭10墓出土的和浙川仓房乡东沟村征集的莲瓣钮盖波曲纹方座簋，器形、纹饰完全沿用了西周晚期虎簋的样式。而且浙川徐家岭10墓出土的方座簋与同墓出土的其他青铜器在器形、纹饰上也形成不了组合，显得非常突兀。这种突兀的现象不是可以用这四件方座簋是外来器物或随葬的早期器物可以解释的，因为在该墓中还出土有三件龙纹鬲，鬲的器形和浙川下寺一号墓出土的分档卷沿鬲完全相同²¹，但器腹却装饰有西周中晚期和春秋早期鬲形器上装饰比较普遍的龙纹。这种春秋晚期的形制加饰西周时期纹饰的鬲，与完全模仿西周晚期形制和纹饰的莲瓣钮盖波曲纹方座簋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墓葬中，只能说明当时在该地区的青铜器设计和制作中，确实存在着复古的现象。更何况浙川仓房乡东沟村征集到除两耳外，器形纹饰与徐家岭10号墓几乎完全相同的莲瓣钮盖波曲纹方座簋，这就表明当时这种“复古”青铜器的出现，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而是在当地一度可能比较普遍的现象。

2010年10月20日初稿于上海博物馆

²¹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库区考古发掘队、淅川县博物馆《淅川下寺楚墓》60页，图五三，图版二六·2，文物出版社1991年，北京。